

抉剔入微 学者津梁

——冯振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王德明

冯振（1897—1983），字振心，广西北流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教育家和诗人。年轻时在家乡就接受了良好的中国旧式启蒙教育。1924年，前往上海考察教育，拜谒了国学大师唐文治（蔚芝），成为入室弟子，后来又拜在国学大师陈衍（石遗）门下。1927年，被聘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员，后来任教务主任。1937年11月，无锡沦陷，无锡国专南迁，辗转长沙、桂林、北流、蒙山、昭平、容县、广州等地，成为“流亡大学”。1938年起，冯振即担任这所“流亡大学”的校长。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无锡国专成为享有盛名的国学人才培养基地。建国后，先后担任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主任、教授。冯振先生毕生致力于国学教育和文史哲的研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如周振甫、冯其庸、郑学弢、彭鹤濂等出自其门下。著有《自然室诗稿》、《诗词杂话》、《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七言律髓》^①、《说文解字讲记》、《老子通证》、《荀子讲记》、《韩非子论略及提要》、《〈吕氏春秋〉高注订补》等^②。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到，冯振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诸子散文及诗词艺术。在这两方面，冯振先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 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

冯振先生的《老子通证》，对《老子》八十一章作了逐章的注释、讲解和分析，每章分注文、通论、参证三部分。他在《老子通证·凡例》中说：“大要选其精华，求其融贯，

不尚博征，但期约取。间有不同之说，义足并存，无乖宏旨，亦兼采一二，然亦只以两义为限，所以异夫集解也。时有一得之愚亦附焉。”他的《老子》注释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广取博收，不主一家；二是力求简约，不尚博征；三是不宥成说，时有新见。从浩如烟海的《老子》注释中择取合适的注解，本身就需要眼光与功夫；而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就更为不易了，从中可见冯振先生对于《老子》研究的深厚造诣。注释是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通论则是注释的升华，“期在融会一章之义，虽时采前贤之说，仍以个人之义为主”，集中体现了他对《老子》各章的全面理解，其中的许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例如《老子》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对此章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冯振先生的解说是：“为学，知识之事也。为道，修养之事也。知识之事贵博观，故日益。修养之事重约取，故日损。损之又损，约而不已，至于一以贯之，则取精用宏矣。然倘有求损有为之心，则犹未见道也。必损与道相忘而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则与道几为一矣。”这样的解说圆通而富有新意。再如第七十一章是一段近乎绕口令似的文字：“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冯振先生的理解是：“知之而自以为不知，则其知必日广，故谓之上。不知而妄以为知，则其不知，终无知之日，故谓之病。能以病为病，则其病可瘳，且至于无病。圣人非必无病也，以能病其病，故终无病也。”言简意赅，

^① 1947年，《七言绝句作法举隅》由世界书局出版。1985年，中国书店又据世界书局版影印。1986年，周振甫、彭鹤濂将这三部书合为《诗词作法举隅》，由齐鲁书社出版。2005年，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本文所引《诗词杂话》、《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七言律髓》均为中央文献出版社版《诗词作法举隅》。

^② 《老子通证》、《荀子讲记》、《韩非子论略及提要》、《〈吕氏春秋〉高注订补》原有油印本，后收入曾德珪先生选编的《冯振文选》中，200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可谓一语中的。参证部分是摘取《老子》或其他先秦诸子相似的论述,以供参考,类似于同一观点下的资料汇编,对于理解《老子》原文有很大帮助。由此可见,冯振先生对于《老子》的研究是比较全面而透彻的。

《荀子讲记》只论不注,与《老子通证》有所不同,主要评论《荀子》各篇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艺术,全面反映了冯振先生对于《荀子》的看法。在论述《荀子》各篇时,往往先概括其大旨,然后再逐一展开论述。在论述中,表现出洞微烛隐的眼光,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看法。例如第十七篇《天论》云:“财(裁)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对此,冯振先生认为,佛家主慈悲,戒杀生,其说不可以充量行之,固甚易见。孟子“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就世俗言之,犹属迂阔而难行。相比之下,荀子此说“慈爱利益,惟以其类为限,则杀生在所不禁,而族类可以不坠。又同类互助,其战胜异物者,不致反而自残,此则有赫胥黎之善而无其弊者也”,观点公允而独到。同时,冯振先生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毫不客气地从文学的角度指出了《荀子》的许多篇章写得平常,不够精彩。如认为第十三篇《臣道》、第十四篇《致士》、第十五篇《议兵》、第十六篇《强国》“平凡无精要语”。而自第二十四篇之后的《成相》、《赋篇》、《大略》三篇,“均非荀子精义之所在”。就是一些写得比较好的篇章,他也认为有不少平庸之处。如认为第十一篇《王霸》自“伤国者何也”以下,“平实之言,无甚精义”。第二十篇《乐论》自“乱世之征”以下,“亦无精要语”。在冯振先生看来,这些篇章在思想和艺术上缺少新意,要么重复自己,要么重复别人。例如《臣道》“与首章文法全同”。《议兵》是“通常议论,通常文法”。《强国》也是“荀子通常议论,其文法则大同小异”。这些看法,一针见血,精辟深刻。

《韩非子论略及提要》的体例又不同于上述两部著作,它分论略和提要两部分。论略部分虽然也是论述,但不像上述两部著作是以篇章为单位,而是从《韩非子》各篇中提取了韩非子在法术、君臣、赏罚、重刑、必罚、威严、去仁爱、去施与、主道、刑名、参验、功用、立法、明法、去私、任法等十六个问题上的看法加以评述,先是征引《韩非子》各篇关于某一问题的原文,然后以案语作评论。这些案语同样表现了冯振先生犀利的眼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例如韩非子关于“参验”的思想,冯振先生认为:“韩子以为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

群臣诬能。吾非以为不然,然君恶奢则臣俭,君恶惰则臣勤,又何伤乎?若谓彼虽貌为勤俭,而实心欲奢惰,则韩子固但求人不得为非而已,不求人之自善也。至于君见好则群臣诬能,非君好而群臣诚能之患,患其非诚能而诬之曰能耳。苟有术使人不能诬能,则无患矣。参验即使人不能诬能之术也。故韩子之言参验也可取,而言掩情也全非。”深中肯綮,发人未发。提要部分虽然重在概括《韩非子》各篇要义,但时有评论,同样也表现了冯振先生的独到见解。例如第二十篇《解老》,冯振先生认为:“此篇解释老子,多精到之言……道之道非常道数节,尤为精辟。”而认为第二十五篇《安危》:“言安术七,危道六。及法因自然。大抵法家常言,无甚精义。”这些看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吕氏春秋〉高注订补》则是对《吕氏春秋》高诱注本的校勘注释之作,以校勘为主,兼顾注释。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参考了王念孙《读书杂志》、洪颐煊《读书丛录》、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札迻》、马叙伦《读〈吕氏春秋〉记》等著作,对《吕氏春秋》原文和高诱注的校勘和理解多所发明,提出了许多新的意见。如《季春纪·尽数》:“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逾来。”冯振先生案曰:“‘上’、‘尚’古通用。”又如《季冬纪·士节》:“贤方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高诱注云:“得贤而仕之,故佚于治事也。”冯振先生认为,高注中“仕”字乃“任”字之误。这些校语和注释对于研究《吕氏春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冯振先生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兼重义理和考据,渊博扎实,见解精辟,确属学术精品。

二 对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作法的研究

冯振先生对中国古代诗词的艺术,尤其是对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作法作了系统研究,这以他的《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七言律髓》为代表。

《七言绝句作法举隅》最终完成于他任教无锡国专时的1935年,兼有诗选和诗论之意,以分类归纳的形式总结中国古代七言绝句的写作方法,“示人以规矩”。在《七言绝句作法举隅自叙》中,冯振先生将文学分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两个并行的体系:“文学之事,约分二道,曰能曰知。沈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是能者未必知也。钟嵘评诗尽工,而所作不传,谅无佳构,是知者未必能也。于工文何与?能而不知,抑何损焉。大匠能示人以规矩,而不能使人巧。巧,能者之事也。示人以规矩,则知者之事也。虽不能使人

巧，示之以规矩，不犹愈于已乎？”能是诗人作家的特长，知是理论家的责任。显然，冯振是知能兼擅的。于是，“先博举其例，而后综辑其法，名之曰《七言绝句作法举隅》。盖非谓七绝作法遂尽于此也，抑由此而稍明所谓法者，则于为诗之道，不无小补焉”。后来在《再版七言绝句作法举隅自叙》中进一步说：“使在举例之中，兼寓选诗之意。讽诵吟咏，其味无穷。二者兼营，庶几知能两益。”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一共归纳总结出了五十六种七言绝句的作法，选录了自唐迄清的一千四百余首七言绝句作为范例。这些作法，当然是从写作的角度来讨论的，其实也是对中国古代七言绝句艺术结构所作的精彩分析，其突出的特点是从字句的运用来揭示七言绝句的一些规律性的作法。大体而言，主要是从关键字词的重复和运用，关键字词在诗中、句中的位置，句式的设置与关键字词的运用相结合，关键字词的使用、所处的位置与句意的结合，关键字词之间的互相呼应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例如所举的第一种作法是“四句旋转而下，故第四句必有一二字与第一二句相复者，而句首并多用‘却’字。凡绝句三四句必紧接，而与第一二句却多不即不离，以转捩关键，全在第三句也。惟此类，则第四句必与第一二句呼应极紧，盖四句一气转下者也”。所举的诗例是唐代贾岛的《渡桑干》、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宋代王安石的《州桥》、张耒的《夜闻风雨有感》、陆游的《乾道初予自临川归钟陵李德远范周士送别于西津是日宿战平风雨终夕今自临川之高安复以雨中宿战平怅然感怀》、邵博的《题智永上人潇湘夜雨图》、明代徐渭的《寄沈子》、陈献章的《黄别驾报世卿将来白沙》。对于这些诗，冯振先生认为，那些反复出现的字词和“却”字是这些诗谋篇布局的关键，因此，特意将“却”字和那些在诗中反复出现的字词圈出，不加详细评说，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又如第二十四种作法是“第四句用‘知是’或‘知有’、‘知在’二字冠之，而在第三句则必预言其所以知之之故也”。如清顾嗣立《谁庄杂诗》：“独坐茅亭午不哗，天光云影净无涯。无端小犬吠墙角，知有闲人来看花。”在这首诗中，第四句中的“知有”二字是关键字词，故特别加以标出。第三句是果，第四句是因，用“知有”来说明第三句中所描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再如第四十一种作法是“第三句三四两字皆用‘最是’或‘只有’、‘惟有’，而第四句则或用‘依旧’、‘犹’、‘还’等字呼应之”。例如韦庄《金陵图》：“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

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的三四句有着冯振先生所说的关键词“最是”、“依旧”，这两个关键词存在明显的互相呼应关系。

诗法的分析，在唐代就成为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宋代以后，更是诗论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产生的著作也不计其数，但很少有人像冯振先生的《七言绝句作法举隅》这样，集中分析七言绝句的作法；也很少有人像冯振先生这样，从关键字词入手对七言绝句的作法有如此详细精到的分析。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冯振先生的分析以关键字词为主要的突破口，从具体的做法来看，显然是抓住了中国古代七言绝句的关键，同时也揭示出了中国古代七言绝句在句法、章法上的一些重要特征。冯振先生拈出来的七言绝句五十六种作法所提到的关键字词，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在诗中反复出现的实词，一部分属于古人所说的虚词。而这些反复出现的实词和关键性的虚词恰恰又是七言绝句中显示全诗意脉，形成全诗特殊意蕴和曲折的关键。就反复的实词而言，以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为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第二句和第四句中的“巴山夜雨”四个实字作为关键词被冯振先生圈出。这四字出现两次，属于冯振先生所说的“第四句必有一二字与第一二句相复者”。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字面的重复，实际上它们不仅强调了“巴山夜雨”这四字，而且构成了这首诗的特殊韵味，使全诗的意脉更为清晰，同时也兼有回环反复之美。至于关键性的虚字，宋人罗大经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作诗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入’与‘归’字，‘贫’与‘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何’与‘且’字，‘岂’与‘应’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文亦然。诗以字，文以句。”（《鹤林玉露》甲编卷六）“健字”一般是诗眼或句眼，而“活字”则往往是虚词。正是通过虚词的运用，诗才有活力，才能运转，形成特殊的韵味。罗大经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七言绝句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这“语近情遥，含吐不露”的艺术效果，很多情况下正是通过冯振先生所拈出的这些关键字词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抓住了这些关键字词，等于是抓住了中国古代七言绝句句法和章法上的牛鼻子。在其背后，肯定有冯振先生对这些关键字词独特作用的深刻认识，

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对此作详细的论述。另外,冯振先生在分析这些七言绝句的作法时,表面上是分析字词的安排运用,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他并非是将七言绝句的作法简单地解释为安排这些字词,而是将它们安排与全诗句式的安排、全诗的谋篇布局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五十六种作法,其实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方法。表面是字词,实际是全局,是诗的句法、篇章结构与布局的诸多问题。

冯振先生的另一部诗法分析著作《七言律髓》也作于任教无锡国专时,书名显然取于方回《瀛奎律髓》。此书仍然采取从关键词入手,结合选诗的形式,来分析七言律诗的章法结构。入手处在字词句,落脚点还是在七言律诗的结构和布局,与《七言绝句作法举隅》同一思路。全书分二十部分,系统分析总结了中国古代七言律诗的二十种作法。这二十种作法主要是七言律诗的八句在章法上的表现,具体说来就是各句在内容表达上的总与分的关系、承接关系、因果关系、诗句的侧重点等。每一种作法选取具有相同或相似章法的若干首诗为例加以说明。例如第二种作法是前二句用二字领起,三四句分承。如杜甫的《吹笛》前四句:“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傍关山几处明。”冯振先生认为:“首句以‘风月’二字领起,三四分承。”也就是说,第一句中的“风月”是总,三四句中的“风”、“月”是分,是承接。为进一步说明这一作法,冯振先生再举杜甫的《野望》、《立春》,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刘基的《二月二十三日自黄冈还杭途中作》,宋湘的《制府蕉园先生命题摄山图》、《见张船山归田诗卷因次其韵》等人的作品加以强调,这样就起到了举一反三,纲举目张的作用。再如第十六种作法是今昔未来的处理。冯振先生认为,这种作法存在着几种情况:一是前六句言昔,后二句言今。二是前五句言昔,后三句言今。三是前四句言昔,后四句言今。四是前三句言昔,后五句言今。五是一二三句忆昔,四五六句感将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变化。这种时间关系的表现,往往通过“忆昔”、“当年”、“忆”、“当时”、“记得”、“即今”、“重来”、“今日”等关键词来实现。为了说明这一作法,冯振先生先选杜甫的《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为例:“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孤城此日堪肠断,愁对寒云雪满山。”冯振先生分析此诗:“前六句皆忆去年之事,末二句乃今日之事。首二句以‘忆昨’、

‘去年’领起,七句以‘此日’作收。韦庄《忆昔》诗略同此法。”这就指出了杜甫这首诗在章法结构上的特点。接着再选杜甫的《秋兴八首》中的五首,唐郎士元的《赠钱起秋夜宿灵台寺见寄》,罗隐的《绵谷回寄蔡氏昆仲》、《寄前宣州窦尚书》,韦庄的《忆昔》、《长安清明》,宋王禹偁的《寄弼山主簿朱九龄》,晁冲之的《次二十一兄(季此)韵》,吕居仁的《追记昔年正月十日宣城出城至广教》等六十余首诗来分析其章法结构上的特点、规律与变化。这样的分析,是建立在大量细读中国古代七言律诗的基础上的,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敏锐的艺术眼光。这充分体现了冯振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章法结构分析细致入微,善于归纳总结的特点。虽然参考了前人的看法,但是其系统性和全面性则远超前人。

此外,冯振先生还对其他诗词作法和艺术问题作了非系统性的研究,这以《诗词杂话》为代表。《诗词杂话》共收一百九十四则,主要论述了诗词中的炼字、用典、对仗、构思、渊源等问题。写得也较为随意,类似于传统的诗话、词话。虽然零散而不系统,但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例如第八十四则谈到李白的《静夜思》这首家喻户晓的作品,古人常认为它“纯是天籁,冲口而出,其妙处不可言说”。冯振先生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认为此诗首句:“不过言月光照到床前,较之‘明月照高楼’、‘薄帷鉴明月’等句,尚觉不逮。次句见月疑霜,便不直致。正如好花说似美人,美人说似好花;真山水说似图画,图画说似真山水,便觉耐人寻味……至末二句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看似寻常,实亦精切。盖月照四方,无分彼此,见月而起思乡之感,极其自然。古今望月思乡之句不知多少,此处妙在仰而望,俯而思,俯仰之间,叹感之感,交集并至,情意之浓厚深挚,不待言矣”。这不仅破除了过去关于李白此诗妙处不可言说的观点,而且详细地分析了其艺术上的精妙之处,分析细致,眼光独到。再如第一百五十五则讨论黄庭坚“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及陆游“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今人作诗,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相信很多人会赞同陆游的观点,对黄庭坚的看法不以为然。冯振先生则认为两种观点均有其可取之处:“二公之论,若相水火,要亦各有特见。譬诸用药,贵乎对症。石膏大黄,附子肉桂,寒热不同,用之得当,俱可起死回生耳。山谷之言,盖重积学,所以

药空疏之病，而‘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则尤贵化臭腐为神奇，岂堆垛捋扯死于句下者可比。且‘夺胎换骨’，山谷固尝以之语人，然必有胎有骨，而后可夺可换，则所谓无一字无来处者，亦谓求古人之胎骨而夺之换之耳。读书不多，根底浅薄之人，确当以此为法。放翁之言，盖重悟入，所以救板实之弊……”在认同陆游观点的同时，又认为黄庭坚的看法是一种“特见”，并给予积极肯定，这就与众不同，显示出其独到之处了。类似这样的看法在《诗词杂话》中实在不少，这是冯振先生丰富的诗词鉴赏与创作经验的总结，对于我们深入细致地认识传统诗词的艺术，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三 研究特色与方法

如上所述，冯振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诸子散文和诗词艺术这两个主要的方面，涵盖面很广，从先秦直至明清。如果说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侧重于考据、义理的话，那么，对诗词艺术的研究则侧重于辞章。两者合一，恰好就完成了姚鼐所说的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冯振先生曾在《冯振小传》中自云：“每不自揆，广心博骛，义理、辞章、考据三者，每欲兼营并包，而所得皆浅。义理好先秦诸子，兼治宋明理学；辞章好诗古文辞，不拘之于宗派，而浮词滥调，在所必摈；考据好许氏说文，而清儒形声故训之学，亦颇心醉。”^①可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举与统一，是冯振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这种统一没有深厚的国学基础，渊博的学识，是很难达到的。它既是冯振先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同时也是他之所以能取得较高成就的重要原因。

冯振先生对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诗法的系统研究在同辈学者中独树一帜。他的同辈学者，要么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多作思想、文化的分析；要么是受传统影响，多为笺注之作。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诗词的艺术情有独钟，但很少有人像冯振先生这样，专注于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诗法的系统研究，这就从研究的对象和角度上区别于其他学者，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正如彭鹤濂先生在为中央文献出版社版《诗词作法举隅》所作的跋中指出的那样：“此三书皆言作法。窃意今之言诗者，即喜诵历代诗词名作，尤喜探其艺术特征。冯师兹辑，两皆

得之。其书博采自唐迄清诸家诗词之作，每多佳构，流览讽诵，不啻历代诗词选也。尤可贵者，其所谓作法，皆就诗词之艺术特征言之，其中有创新者，有仿制者，有仿制而变化者，足以窥见诗人之匠心独运，探测历代诗词名篇之艺术宝藏，使人爱不忍释。”彭鹤濂说到了冯振先生两方面的成就，一是选诗词之功，一是对诗词作法的揭示。后一方面的成就因为见解独特，洞微烛隐，“足以窥见诗人之匠心独运，探测历代诗词名篇之艺术宝藏”，尤其令人称道。这充分表现了冯振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同时也指出了他鲜明的研究个性。

自唐代以来，针对后生学子的诗法著作就不断涌现，从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署名白居易的《金针诗格》，到宋代署名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惠洪的《天厨禁脔》，再到明人胡文焕的《诗法统宗》、清人顾龙振的《诗学指南》等，虽然总结出了不少诗法，但大多陈陈相因，缺乏新意。如果想偷懒，是不难从这些著作中搜集资料，为学生提供一部诗学指南的。冯振先生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对大量中国古代诗词的细读研究，自己总结出了五十六种七言绝句的作法、二十种七言律诗的作法。这些作法虽然不能说全都是冯振先生的独创，但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归纳和总结，颇具新意，用力甚勤。

作为一名高校教授，冯振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始终是与教学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教学而作，因此，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目的不仅在于学术发现，同时也是为了育人。而在育人上，冯振先生又不仅仅局限于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中国古体诗词的写作能力。这就使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了研究、教学与创作三结合的鲜明特点。如果说，作为教学的讲义，冯振先生关于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的几部著作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的话，那么，他对于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诗法研究的著作，则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中国古体诗词的写作能力。他在《七言绝句作法举隅自叙》中明确写道此书是“示人以规矩”，“不失示人以规矩之意”。周振甫先生在谈到《七言绝句作法举隅》时也说：“这本书虽自称‘示人以规矩’，我们正可从这种规矩中探索它们的巧拙，探索它们在艺术上的所以成功，或在艺术上所以失败的原因，

^① 冯振《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供我们借鉴。”^①也正因为这样的特点，钱锺书先生称誉冯振先生的研究是：“博征详说，抉剔入微。学者津梁，舍此安属？”^②这十六字准确地指出了冯振先生对诗法研究的贡献和特色。将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这在与冯振先生同辈的学者中不乏其人，而将研究、教学与创作结合起来，则是他的前辈、同辈和后辈学者普遍缺乏的。正因为冯振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这样的特色，所以，他的学生中往往既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同时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古体诗词创作功夫，冯其庸等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从研究方法来说，冯振先生几乎不借助于外来的所谓新方法，而是继承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作品本身，通过对作品的细读，得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因此，细读、比较与归纳，这可以说是冯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基本的方法。

冯振先生在《再版七言绝句作法举隅自叙》中说：“余旧纂《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以归纳之方法，阐七绝之结构，见者颇惊新创。”冯其庸先生在《怀念我的老师冯振心先生》中说：“冯先生讲诗，就是用他的著作《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他着重讲诗法，而且他讲的诗法，是他自己从大量的唐宋元明清的七言绝句里概括归纳总结出来的，讲解时一经点破，似乎恍然大悟，无甚奥秘，但难在未点破之前，能从大量的诗作中发现其自身的种种规律，形成诗法，这就实在不容易了。”^③冯振先生的夫子自道和冯其庸先生的论述都指出了归纳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当然，归纳是要以细读和比较为前提的。细读才能发现问题，也才能比较，然后归纳，这些基本的方法贯穿于冯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著作中。彭鹤濂曾说：“冯师之论创作也，出于比较，尤与今之学者喜言比较文学为近。”^④

《七言绝句举隅》每论一种作法，都要选大量作品为例加以说明。所选诗的时代侧重则有所不同，而同一时代诗歌，所选作家频率又有所侧重。这样，读者就可以从中窥见不同时代之间，不同作家之间七绝作法不同的风尚、不同的句法习惯和不同的审美倾向。无形中就形成了两个比较：一是不同时期诗人同类作品类比，一是不同作法之间的对比。而在比较中可以看出细微的差异。

《七言律髓》也是如此，如在苏轼《和子由澠池怀旧》下引纪晓岚评语云：“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浑不及崔司勋黄鹤楼诗，而撒手游行之妙，则不减义山杜司勋一首。”以宋人诗和唐人七律诗中负盛名者比较，认为《黄鹤楼》一诗的“浑”为苏诗所不及，而语言如行云流水般一气直下，诗情的倾泻、意象的跳跃不减李商隐的《赠司勋杜十三员外》。或以唐人诗互相比较，如论李商隐的《赠司勋杜十三员外》：“前四句连用叠字，一气直下，与崔李诸作，又同中有异。”或以明清诗与前代诗比较，如明代邝露《浮湘礼三闾暮田寻贾生故宅》：“与高达夫《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一首相似。”正是通过认真的细读和大量的比较归纳，或同中见异，或异中见同，冯振先生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古代诗词作法上的许多共同特点和细微差别，令人耳目一新，给学诗者以许多实际的指导。

这样的方法同样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中。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著作浩如烟海，不细读难以发现问题。在细读的基础上，冯振先生通过大量的比较、归纳，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老子通证》中的参证部分虽然是以引文为主，但实际上就是将《老子》和其他典籍中的不同材料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而通论部分则是具体的比较与归纳，结论由此得出。《荀子讲记》和《韩非子论略及提要》也是如此。如《荀子讲记》中的《性恶篇》，为辨别荀子三个重要概念性、情、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冯振先生从《荀子》中摘出十三条关于这三个概念的材料参稽比较。经过一番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性’、‘情’、‘欲’三字，以通常解说，则‘性’、‘情’本通为一，不过有体用动静之别。性之显情，犹水之生波。情之附性，犹波之依水。二者固不可离者也。故‘性’、‘情’二字，对举则有别，单用连用则若一。至于‘欲’则为‘情’之一部，虽有广狭之分，绝无彼此之异。”

冯振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不可谓新，但他却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冯振先生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敏锐的学术眼光。他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以后又受教于名师门下，长期担任教职，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这样的成长环境为他博览群书提供

① 《诗词作法举隅序》，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版《诗词作法举隅》附。

② 钱锺书先生致冯振女儿冯采芹函，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版《诗词作法举隅》前附信函照片。

③ 载《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

④ 《诗词作法举隅跋》，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版《诗词作法举隅》附。

了良好的机会。再加上冯振先生为人淡泊，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一生乐趣全在读书、教书。因此为学益广，为文益精。从上面所列冯振先生的著作可以看到，他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既有文学的著作，也有语言学的论述，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清代、近代。笔者因研究的需要，曾翻阅过冯振先生的部分藏书，一方面感叹他藏书之富，另一方面也叹服于他读书之勤。在一些很冷僻的小书上，也常常留有他的批语。胡光舟先生说：“振心先生治学实已成了惯性，他手中那枝红蓝笔总是不停地批点古籍。他广博深刻，对古代诗词记诵之博，到使人吃惊的程度。”^①可见，冯振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建立在他广博的学识上的。有了学识的厚度，才可能有学术的高度。

冯振先生又是一位诗人，有《自然室诗稿》，对诗歌创作有深入的体会。这也对形成他的研究特色，在诗词艺术的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有重要影响。他曾有诗云：“前有柴桑后辋川，瓣香敢妄望名贤。千锤百炼归平淡，妙手文章只自然。”这既是他对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认识，同时也是他自己对诗歌创作的体会。冯振先生的诗歌风格平淡，但艺术高超。这样的境界，是冯振先生长期坚持对中国古代诗法的研究，自己创作古体诗词，创作与研究相辅相成的结果。冯其庸先生在《怀念我的老师冯振心先生》中谈到冯振先生在诗法研究上取得成就的原因，指出：“就是因为冯先生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创

作了大量的优秀的诗篇，他有艰苦的创作实践经验，所以能独得诗法之秘。”^②他将自己的创作体验融入研究之中，沟通古今，揭示诗歌创作中的艺术奥秘，体会更加真切，所得更加深刻。如《诗词杂话》第八则举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明樊阜词“愁来自起推窗看，人比梅花瘦几分”，又举他自己的诗“病怯西风帘幕底，不知肥瘦比黄花”，比较后认为，同是将人之清瘦比作花，而程度不同：“李词‘人比黄花瘦’为决定之词，樊词‘人比梅花瘦几分’虽决定其为瘦，而瘦之分量尚未定；余诗则并肥瘦都不可知。此又同中有异者也。”谈到诗学李清照句而有变化，说“余诗则并肥瘦都不可知”，既是客观评价，又指出了诗句的创新之处。又如第二十三则：“余旧有五言绝句云：‘妾住西江头，郎住西江尾。欲识相思情，但看西江水。’后读李之仪词，见其《卜算子》上半阙云：‘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命意遣词，几全相类。然余彼时实未尝读李词也。”描述作者自己的创作体验，揭示古今诗心之相通，发人深省。

冯振先生已去世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他的许多同辈学者一样，已成为一座在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高山。我们在仰望高山的同时，更应当想到还有攀越高山的责任和任务。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高山既是标杆，同时又是一种召唤。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 《冯振的为人、为诗与为学》，党玉敏、王杰主编《冯振纪念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载《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